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长效困境与实现路径^{*}

贾则琴 龚晓莺

内容提要：新时代共同富裕是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共同富裕，是社会发 展概念、社会变革概念、美好生活状态概念的集合体。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在明晰新时代共同富裕独特内涵的基础上，关键要厘清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所面临的长效困境并找出其破解思路。当前，相对贫困问题、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问题均为阻碍共同富裕长期性与稳定性的现实桎梏，必须逐一破解，其破解思路为：一是扎实推进“先富带后富”，着力破解相对贫困难题；二是培育可持续发展方式，筑牢共同富裕生态基础；三是调整认知偏差，多措并举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关键词：新时代 共同富裕 长效困境 相对贫困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22）04—0020—10

DOI：10.20003/j.cnki.xjshkx.2022.04.003

作者简介：贾则琴，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龚晓莺（通讯作者），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92）。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十个明确”的重要内涵之一，同时也将“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总结为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①可见，共同富裕必将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 重要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目标。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在明晰新时代共同富裕独特内涵的基础上，关键要厘清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所面临的长效困境并找出其破解思路，才能为共同富裕的最终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一、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涵解读

明晰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是厘清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和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理论前提。新时代共同富裕是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共同富裕，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本质上是社会发展概念、社会变革概念、美好生活状态概念的集合体。

第一，新时代共同富裕是要求社会结构更加优化、社会制度更加完善的社会发展概念。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实现包含着对社会发展的美好期许，是人民群众物质、精神、政治、社会、生态生活“五位一体”各方面都富裕。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我国社会结构将更加优化。宏观层面来看，我国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和生态结构都将发生改变；微观层面来看，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也将得到大幅度调整。同时，在保证社会主义制度方向不变的情况下，我国的各项社会制度也将逐渐完善、优化，将朝着有利于共同富裕实现的方向调整。因此，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共同富裕是一种社会发展概念。

第二，新时代共同富裕是要求彻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社会变革概念。党的十九大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劳动收入应有份额及实现机制研究”（17BKS053）的阶段性成果。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 年 11 月 17 日第 1 版。

报告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是我国现阶段的最主要矛盾。解决好发展的“不充分”问题,才能达到“富裕”的目标;解决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才能达到“共同”的目标。但是,这不但还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需要直面我国现有社会体系中的各类尖锐问题,因此,共同富裕在此层面上是一种社会变革概念。

第三,新时代共同富裕是要求实现公平与效率并存、共建共享的美好生活状态概念。从本质上讲,共同富裕是对一种生活状态的概括和描述。具体而言,新时代共同富裕是合理差距基础上的富裕,不是同时同步同等富裕,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富裕;新时代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是“共建”和“共享”相统一的富裕。

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长效困境分析

长期性和稳定性是检验一种社会状态是否真正实现的重要标准,因此共同富裕的实现除满足生产发展、成果共享的基本要求外,还必须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围绕长期性与稳定性的目标,透视当下社会,阻碍新时代共同富裕实现的长效困境主要包括:相对贫困问题、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问题。

(一) 缓解相对贫困道阻且长

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庄严宣告我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并进一步指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②。相关研究发现,2002—2018年期间,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率上升了5.6%。^③因此,实现共同富裕要求我们必须有效缓解相对贫困。^④立足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缓解相对贫困的主要障碍包括:脱贫攻坚工作阶段性“返潮”、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路径不明晰及“先富带后富”机制与路径不明确等。

首先,防止返贫任重道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始终将反贫困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之一。在反贫困过程中,返贫现象始终与反贫困工作相伴而行。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在救济式扶贫阶段、开发式扶贫阶段、精准扶贫阶段返贫现象时有发生,并且关于返贫问题的研究也从未终止过。^⑤现阶段,我国已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但是防止返贫仍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原因如下:其一,返贫原因复杂且短期内难以克服。通过相关文献阅读和梳理并基于我国现实发展情况,总结出导致返贫的原因主要包括:生态环境恶劣、产业基础薄弱、突发灾害与疾病、扶贫措施不可持续、内生动力不足等,其中生态环境、产业基础及突发灾害与疾病属于不可抗力因素,扶贫措施与内生动力问题需要长期探索与优化。此外,一个地方或家庭返贫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很多时候是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的,逆转这一趋势也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其二,防止返贫长效机制建设待优化。多年以来,我国始终以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反贫困工作的重点,在精准扶贫后期,逐渐开始关注返贫现象并探索防止返贫的相关机制建设,但到目前为止关于返贫的界定标准、预警机制及治理机制等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0页。

③ 胡联、缪宁、姚绍群、汪三贵:《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变动和分解:2002—2018》,《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年第2期。

④ 相对贫困,是一种对人民收入水平及生活状态的判断。世界银行认为收入只要等于(或少于)平均收入的1/3的社会成员便可以视为相对贫困。

⑤ 李晓园、汤艳:《返贫问题研究40年:脉络、特征与趋势》,《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9年第6期。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出,“三农”工作应“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①,彰显了“防止返贫”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及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应发挥底线思维,始终高度重视并努力完善相关制度建设以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发生。

其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难度较大。乡村振兴战略是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产生的关于未来我国乡村发展建设的战略规划,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就两者衔接的总体要求、重点工作及机制建设等提出具体规划,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提供顶层设计与原则指导。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缓解我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的重要手段,也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内在要求。但其在推进过程中仍面对较多困难,包括:第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政策存在张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都是促进我国农村地区共同富裕的战略规划,但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目标上,脱贫攻坚聚焦贫困人口增收,乡村振兴关注农村生产、生活全局发展。在时间跨度上,脱贫攻坚是中短期规划,要求短期内精准突破;乡村振兴是中长期战略,要求长期全面优化。在涉及群体上,脱贫攻坚关注农村贫困人口,乡村振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正是由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存在的天然差异,促使两者在衔接上存在一定困难。第二,人才队伍建设不充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虽然设置了五年的过渡期,但随着大量扶贫工作队撤离,为衔接带来了人才压力。从长远来看,要想促进乡村真正振兴,必须培育愿意留在乡村、建设乡村的青年人才,包括返乡创业大学生、愿意长期留在乡村的扶贫干部等。乡村振兴根本上是“乡村人”的振兴,只有实现乡村人才振兴才能实现乡村真正振兴。第三,内生动力与“造血”能力需加强。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其最终目的都是使广大乡村居民富裕起来,归根到底需要增强广大农民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和自身的“造血”能力。脱贫攻坚后期,习近平要求要做到“扶贫”与“扶智”和“扶志”相结合。因此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必须要坚持“兴志”和“兴智”相结合。但较为困难的是,观念与意志的提升需要较大时间成本和政策红利支持。因此,内生动力和“造血”能力不足成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主要障碍。第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改善难度大。由于地理位置、政策资金偏向等问题,农村基础设施水平相较城市存在较大差距。同时,我国农村分布较分散,部分地区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基础设施投资很难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的自然与社会阻力均较大。此外,虽然多年来我国始终致力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进程相当缓慢,始终未达到预期。城乡、区域之间在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

最后,“先富带后富”机制待完善。1992 年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谈话时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②邓小平提出的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即两极分化问题,在现实中表现为地区、行业、城乡、收入差距大的问题。当前,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早已到达解决两级分化问题的迫切关头,但是“先富带后富”的机制尚需下大功夫完善。邓小平在其相关论述中也提出了“先富带后富”的具体措施,即“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③。但是,当前情况下对“先富带后富”机制的实现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主要问题与阻力表现为:第一,“先富带

①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人民日报》2021 年 12 月 27 日第 1 版。

②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74、374 页。

后富”理念推广受阻。“先富带后富”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先富群体是否具有带动后富群体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这要求先富群体树立并认同“先富带后富”的理念与方法论，必须讲清楚“先富带后富”的原因。当前，在资本要素的驱使下，利益分配成为影响人们行动的重要指南。让先富群体放弃财富代际传递将财富用之于社会成为极其困难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有学者提出通过阐明先富群体的富裕获益于我国三大历史时期的政策红利及人民奉献精神等正外部性来激发先富群体反馈社会的主动性，^①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第二，“先富带后富”措施力度不够。目前“先富带后富”所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但实施力度远远不够，在有些层面反而适得其反。在税收上，我国的税收政策需要向着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方向发展，现有税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调节过高收入的作用，但是力度较小并且税收并未在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上发挥较大作用。“如果综合考虑直接税和间接税，最后的结果是税收在扩大收入差距，它会使得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上升2—3个百分点”^②，这一观点虽看似夸张，却是对我国税收政策现状的真实反映，具有一定的数据支撑。在社会保障上，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目标是保障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是很大。从数据上看，我国实施低保等社会保障措施所覆盖人数多、区域广，但是综合我国人口基数大的国情，依靠社会保障降低基尼系数仍需做出更大的努力。转移支付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也存在此方面的问题。总体来讲，我国“先富带后富”相关措施力度远远不够，必须进行全面改革。

（二）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共同富裕阻力较大

新时代共同富裕，从内涵上讲应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富裕，其中生态共同富裕是影响共同富裕长久效能的关键环节，是影响其他环节富裕实现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所提倡的“两山”理论形象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加强“生态红利”挖掘对于“双碳”目标达成、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以及实现美好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以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共同富裕仍然面临重重挑战。

一是有损生态的非可持续性发展方式转变阻力大。经济发展方式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选择的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与方法，包括粗放与集约、可持续与非可持续、数量型与质量效益型等各种形态。转变有损生态的非可持续性发展方式是我国实现生态富裕的首要难题，必须加快解决。首先，高污染、高能耗、高浪费的发展方式转变阻力大。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政策出台已有十年之久，虽然在节能减排方面已取得了许多突破性进展，但仍有许多瓶颈性难题需要突破。第一关为“资金关”。低污染、低能耗和低浪费的生产方式对于生产设备、生产环境的要求比较高，无形之中增加了相关企业的不变资本成本。生态问题已成为衡量产能是否落后的重要标准之一，淘汰落后产能和更新生产设备对企业的资金要求非常高，企业往往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中。第二关为“监管关”。由于企业数量众多，相关监管部门很难全面覆盖，只能依靠突击检查达到相关警戒作用。因此，需要建立健全设备、原材料在市场准入环节的环保指标体系，将破坏生态环境的可能性扼杀在源头。此外，当前与监管配套的惩戒措施力度不够，如果惩戒力度小于企业主通过污染环境带来的利润时，企业主还是会选择继续以粗放的方式进行生产经营。要想提升监管效用，必须提高相关惩戒力度。第三关“理念关”。改变高污染、高能耗、高浪费的消费方式根本上必须建立全民环保理念，提高个人、企业的环保主动性和积极性。其次，产业的无序升级与转换带来生态环境的二次破坏。产业转型与升级成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

① 沙烨：《跨越财富鸿沟》，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

② 李实：《以收入分配制度创新推进共同富裕》，《经济评论》2022年第1期。

内涵。在市场倒逼、国家政策推动的情况下，许多企业主动开始产业升级，但是由于缺乏相关经验，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出现了生态环境二次破坏的现象，例如废弃设备回收、电子废弃物回收不当等问题。

二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难度大。以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共同富裕，要求必须探索出以生态促进经济发展的良方，其中最重要的是确保生态产品价值顺利实现。当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难度较大，主要问题包括：第一，生态产品产供销机制不健全。通常情况下，农村居民是生态产品的提供者，城市居民是生态产品的消费者，在产销过程中存在自然灾害危险、假冒伪劣危险、品牌建设不到位、流通渠道不畅通等问题。生态产品的自然灾害危险具有一定特殊性，致害原因除包括生态产品养护不到位外，还包括种子、土壤环境待优化等；假冒伪劣危险是生态产品与非生态产品难以区别造成的；品牌建设不到位会造成农民的比较收益降低，但是大多数农民缺乏品牌建设意识和品牌宣传与推广意识严重阻碍了品牌建设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生态产品运输难度大，在生态产品流通过程中存在物流体系建设不到位、商品价格层层加码等问题。第二，生态产权与生态补偿机制亟待完善。生态产权稀缺性与生态产权界定成本的下降促使生态产权制度建立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生态产权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设或可成为缩小城乡、区域差距的良方。但是，当前在生态产权制度建设、资金来源上均存在一定问题：制度建设上，在党的相关文件中早就开始提及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等问题，但是在推行过程中，出现只试点不推广或者难推广的问题。同时，在制度建设上，还存在思路固化等理念障碍。在资金来源上，区域、城乡的生态资源产权交易是对交易双方均有利的制度，但是囿于缺乏专项资金或者地方财政吃紧等状况，导致资源产权交易迟迟无法推进。此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生态产权交易制度的补充，其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转移支付，也存在资金来源单一、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生态要素尚未纳入财富分配体系。在西方经济学的视域下，将土地等自然资源排除在生产函数之外，仅仅将劳动、资本作为影响生产的重要因素。其实，土地等自然资源也是生产得以维继不可或缺的因素。随着自然资源短缺、极端气候问题等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良好的生态环境越来越成为影响生产的重要因素。这种情况下，恢复自然资源尤其是生态资源作为生产要素在财富分配中的重要地位对于促进农民增收、生态资源丰富地区增收具有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资本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与话语权，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贡献重要力量。第四，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生态要素挖掘不足。生态产品产供销机制、生态产权与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要素纳入财富分配体系等政策建设均建立在对生态要素的充分挖掘上，必须尽快克服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生态要素利用意识不足造成生态资源浪费的掣肘。

（三）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挑战重重

习近平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①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成为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重要内涵，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地位上讲，能否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影响新时代共同富裕长效性的重要指标之一，精神富足为其他层面富足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精神动力。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人们更加重视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层面，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视程度不足，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众多，主要包括：认知偏差、供给不足、规范建设不足等。

第一，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认知存在偏差。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其重要使命之一，但是以往对共同富裕的强调大多注重物质生活层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

^①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 年第 20 期。

共同富裕的新内涵，人民群众对其认知存在一定不足。一是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当前，我国物质生产力已得到长足发展，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还存在一定短板，相对贫困问题仍较为严峻。因此部分群众尤其是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众，认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可有可无，共同富裕就是指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附属品。同时先富群体中仍存在类似情况，受长期追求物质生活富裕的惯性影响，并未形成对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习惯和生活习惯，因此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以为然。二是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内涵把握不准确。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个新议题，关于精神生活内涵的理解尚没有定论。习近平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包括“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营造促进共同富裕良好舆论环境”^①三大层次。同时，学术界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解参差不齐：辛世俊等认为精神生活富裕是指人民对优秀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和传统文化的认同并用以指导自身行为；^②王淑芹指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指人民具有精神追求、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的能力；^③毛勒堂强调高品质的文化创造和高品位的精神生产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④总体来看，不同学者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内涵的理解角度不同，各有侧重，但对其概念整体性的理解存在差异，需要加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研究，构建科学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体系。

第二，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供给不足。充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供给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当前，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高品质的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稀缺，文化产品与服务地区、城乡供给不均衡两大方面。一方面，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稀缺。近年来，随着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公共文化事业覆盖范围持续扩大，种类逐渐丰富。随着网络的普及，也大大降低了文化事业推广的难度和成本，能满足大多数群众的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相对来说，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比较稀缺，存在收费高、覆盖范围小等问题。另一方面，文化产品与服务区域、城乡供给不平衡。在现有文化产品和服务布局上，主要呈现东部地区数量多、质量高，中西部地区数量较少、高品质产品和服务少；城市数量多、质量高，乡村数量不足、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稀缺的状况。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成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序推进的主要障碍。

第三，文化产品与服务规范性建设需加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必须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因此，要逐步加强文化产品市场规范性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积极健康、向上向善、喜闻乐见的文化供给。一方面，文化产品与服务监管不到位。受文化产品本身性质的影响，在质量监管、价格定位上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加大了管理难度。除图书等普及性较高的文化产品外，大多数文化产品与服务均存在定价过高、质量不过关的问题。近年来，春节档电影、话剧、脱口秀等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但是通常定价过高；同时，娱乐圈众多失德艺人的出现也促使我们思考要加强文艺工作者的门槛准入标准建设，打造一支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要求的文艺团体。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精神文明建设有待加强。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人都可以成为网络博主，文化内容和信号充斥在网络空间的各个角落。我们在享受普惠性文化内容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要时刻防范低俗文化内容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消极影响。因此必须加大网络空

①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② 辛世俊、王丹：《试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实践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1年第6期。

③ 王淑芹：《深化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认识》，《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年第1期。

④ 毛勒堂：《作为总体性的共同富裕及其实现路径》，《思想理论教育》2022年第3期。

间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推进网络清朗活动,向大众提供健康有序的网络文化空间。此外,超前点播、网络会员等平台经济新产物逐渐成为群众热议的话题,必须加强相关监管,营造公平的网络文化产品消费环境。

三、共同富裕的实现:长效困境的破解思路

破解共同富裕的长效困境,是新发展阶段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内在要求。相对贫困问题、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问题均为阻碍共同富裕长期性与稳定性的桎梏,必须逐一破解,才能促使共同富裕长期、稳定实现。因此,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 扎实推进“先富带后富”,着力破解相对贫困难题

相对贫困问题是一个综合、复杂的长期性问题。从过程性上来看,缓解相对贫困问题首先要谨防规模性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其次要努力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以乡村振兴缓解城乡相对贫困;最后,在解决城乡相对贫困这一关键性难题的基础上,要逐渐优化“先富带后富”机制,以发挥机制优越性。由此,构建“防止返贫—乡村振兴—先富带后富”的全过程相对贫困破解机制。

第一,树立风险防控底线思维,优化防止返贫长效机制。优化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关键在于树立风险防控底线思维,加强对规模性返贫现象的监测、评估、预警和干预。首先,依托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构建返贫动态监测机制。贫困监测机制在我国精准扶贫过程中曾发挥重要作用。现阶段,应立足精准扶贫阶段的数据、经验等,结合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手段,构建返贫动态监测系统。在监测对象上,主要应重点关注缺乏致富能力的易返贫人群、突发严重困难人群及未享受精准扶贫政策的边缘易致贫人群三大群体;在监测方法上,主要采取大数据监测和基层干部入户走访的方法。其次,关注易于返贫的重点人群,构建返贫风险评估机制。在返贫动态监测的基础上,构建科学合理的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才能精准定位返贫主体,掌握返贫原因,从而快速采取相应对策。政府部门必须明确“什么是返贫”这一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不可简单沿用精准扶贫阶段的贫困线作为界定标准,必须构建包含现有经济收入、增收能力、致贫风险等因素在内的综合评估机制。最后,保持扶贫政策可持续性,构建返贫风险预警与干预机制。为避免群众养成“等靠要”的懒惰思想,有必要构建风险预警机制,即在检测到群众存在返贫可能性时,不再直接采取物质补给的方式,设定半年到一年的预警期,促进返贫群众自主脱贫、自主致富。针对突发自然灾害、突发疾病致贫,应保持精准扶贫政策的可持续性,健全临时救助等干预机制。此外,为促进干预机制及时到位,必须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夫,为提高干预精准性、有效性提供基本前提。

第二,以增强内生动力为突破口,增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度。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现阶段乡村地区缓解相对贫困、防止规模性返贫的主要途径。但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之间存在一定政策张力,“如何有效衔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讲,促进两者有效衔接,必须以增强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为突破口。只有广大人民群众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积极性、主动性被充分调动,促进群众观念由“被动扶”转向“主动兴”,才能真正实现乡村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转换。具体而言,必须在促进两者政策衔接、组织衔接及主体衔接上下功夫。首先,突破理念差异,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政策衔接。政策衔接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核心和基础。将脱贫攻坚相关政策纳入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关键在于政策理念转变。一是要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的总体稳定,但并不只是扶贫政策的简单延续,而要突出发挥一些补短板、强基础和利长远政策的作用;二是要优化、创新相关政策,在坚持相关扶贫政策的基础上,出台贫困边缘户支持政策、防止规模性返贫政策及脱贫人口能力提升政策。其次,加强党建引领,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组织衔接。组织衔接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保障。无论是脱贫攻

坚还是乡村振兴，都需要建立科学高效的组织管理机制。在脱贫攻坚期间，各地区通过实行五级书记抓扶贫的工作机制，以党建引领为脱贫攻坚胜利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组织衔接，一是努力促进乡村组织振兴，在促进基层干部年轻化、增强基层干部稳定性上下功夫，继续坚持选派第一书记、组建驻村工作队的惯例，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二是总结运用五级书记抓扶贫的丰富经验，以“五级书记促振兴”的组织机制促进乡村振兴。最后，振兴乡村人才，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主体衔接。主体衔接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人才是制约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乡村振兴归根到底是“乡村人才振兴”。促进乡村人才振兴，一要努力留住脱贫攻坚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扶贫干部，优化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等人才培育政策，培育一支乡村振兴需要的干部队伍。二要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挥新型农民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人才主体作用。三要鼓励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等人群返乡创业，吸纳一批愿意振兴乡村、懂农爱农的人才队伍。

第三，以培育“先富带后富”理念为关键，完善“先富带后富”机制。“先富带后富”是我国推动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径遵循，但在先富群体“先富”起来之后，出现不愿“带后富”、不知如何“带后富”等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我国没有及时做好由“先富”向“带后富”的路径转向，因此必须采取以下措施：首先，超越资本逻辑，廓清“先富带后富”的思想障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受资本逻辑的驱使，先富群体认为其自身具有自由支配财富的权利，“先富群体有义务带动后富群体”这一问题很难被先富群体理解。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要想先富群体主动愿意带动后富群体，必须促进先富群体对共同富裕理念的认同，关键在于使先富人群认识清楚其财富的来源。就先富群体个人而言，其认为自身的财富来自于个人智慧、能力、企业家精神、风险承担等。但先富群体忽略了先辈奉献、国家独立、社会稳定、人民努力、政策科学等外部因素对其财富增长的重要作用，也忽略了在其财富增长过程中带来的环境污染等负面问题对社会发展的破坏作用。只有使先富群体清楚认识其财富的来源，使先富群体在理念上超越资本逻辑，使其主动“带后富”，才能彻底廓清思想障碍。其次，全面深化改革，增强“先富带后富”的措施力度。全面深化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是当前我国促进社会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在税收上，应加大通过税收调节过高收入的力度，通过设立房产税、遗产税等税种，避免由于“炒房”、“财富代际传递”等因素降低社会的流动性。在社会保障上，要加强低保等社会保障制度的补贴力度和覆盖范围，以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从而降低基尼系数。增强转移支付力度和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必须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最后，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先富带后富”的实践机制。构建科学完善的“先富带后富”实践机制是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发展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因此，政府部门必须重视相关顶层设计构建包括动力机制、平衡机制、保障机制、监管机制在内的科学体系，实现由侧重“先富”向侧重“带后富”的政策转向。

（二）培育可持续发展方式，筑牢共同富裕生态基础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生态共同富裕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内涵之一。当前，应以培育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为出发点，以促进生态资源丰富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突破口，多方施力筑牢共同富裕的生态基础。

一方面，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培育可持续发展方式。培育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实质上是对高能耗、高污染、高浪费生产方式的摒弃，是对落后产能的淘汰和先进产能的培育。在现实表现上，要促进传统产业向绿色产业的转型，应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应发展绿色金融，突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资金关”。资金难问题是传统产业转型遇到的首要问题。通过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引导

资金链向环保产业及资源集约技术开发等绿色产业流动,可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向着绿色化、集约化方向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其次,应加大惩戒力度,突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监管关”。监管不严、惩戒力度较小是相关企业“屡教不改”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在惩戒力度上,当其大于或等于企业违反相关政策带来的直接利益时,企业自然会主动选择遵守相关规定;在惩戒方式上,除直接金钱处罚外,应将企业征信、发展机遇等因素纳入惩罚中。再次,应树立全民环保理念,突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念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本上是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多年来,我国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得到大幅度增强,但距离全民环保理念的确立尚有一定距离。通过环保激励机制、全民环保监督机制的确立,将增强民众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四是规范产业升级,突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法关”。现阶段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由于方法失误等原因,出现了生态环境的二次破坏等问题。由此,有必要加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法示范,通过宣传产业升级成功案例、举办交流会、派驻专家队伍等形式,规范产业升级进程,尽可能降低方法引领缺位带来不必要损失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努力挖掘生态资源,确保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生态共同富裕,既要通过生态环境保护,筑牢共同富裕的生态基础;同时也要通过发展生态产业,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共同富裕。一要畅通生态产品产供销渠道,促进生态产品顺利实现市场流通。畅通生态产品的产供销渠道,首先应该在降低生态产品自然灾害危险、假冒伪劣危险、加强生态产品品牌建设、畅通流通渠道上下功夫。降低生态产品的自然灾害危险应通过加强生态产品养护培训,优化种子、土壤等粮食安全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途径,同时应加快生态产品保险制度建设,考虑生态产品的正外部性,保险机构应主要由国有保险公司承担,或者政府应加大对相关保险机构的补贴。降低假冒伪劣危险,要不断加强甄别机制建设,如建立统一的防伪标志或者实行产地直供等。在品牌建设上,当前生态农产品属于完全竞争市场产品,必须加快品牌建设,借助品牌效应促进农民增收。此外,应加强物流体系建设,打造一条直接连接“产地—消费者”的生态物流体系。为避免层层加码的弊端,应通过定向帮扶等政策,畅通生态产品的销售渠道,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二要健全生态产权与补偿机制,促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获得政策支持。当前,我国的生态产权和补偿机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制度建设上,应促进政策制定思路转换,要加强生态产权总量控制、有偿使用、可交易性、封闭产权等意识的培育,扫清思想阻碍,以提高生态资源的资源利用率,共同促进“生态共富”的实现。在资金来源上,各地政府应设立生态产权和生态补偿专项资金,降低由于财政问题对生态产权和补偿机制运行的影响。同时,应努力拓宽生态补偿机制的社会资金来源,增强资金供给。三要将生态要素纳入财富分配体系,促进生态资源丰富地区走向共同富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质上是要改变原有财富分配状况,以此调节过高收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范围。以生态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必须将生态要素作为进行财富分配要素之一,以提高生态资源的重要地位,扎实推动生态共同富裕。四要科学有效地挖掘生态资源,不断释放生态红利。农村地区、西部地区拥有相当丰富的生态资源,但是受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生态资源开发意识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生态资源始终处于闲置状态。科学有效地挖掘生态资源,一方面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与规划。针对适合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等不同情况,请相关专家进行规划设计,以规划带动资源挖掘。另一方面要增强不同主体的生态资源开发意识。除增强当地官员的生态资源开发意识外,更为重要是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生态资源开发意识,增强广大人民群众挖掘生态资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以发挥生态资源的最大红利。

(三) 调整认知偏差,多措并举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新发展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之一,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持

续性工程。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首先应深理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以廓清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思想前提；其次应加强且规范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解决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供给不足的问题，同时也要促进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平衡发展。

首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调整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认知偏差。调整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认识偏差，深化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重要性及其内涵的理解，是促进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思想前提。习近平强调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①。在调整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认知偏差过程中，也要始终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向引领和思想引擎作用。首先，增强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重要性的认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既与精神产品的供给程度相关，也与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一般来说，人民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视程度与社会普遍的教育水平相关。只有社会教育水平较为发达，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需求程度和享受能力得到提高，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才能得到社会多数成员的重视。同时，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是对健康文化，对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文化的需求，而不是对不良文化的需求。其次，深化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内涵的理解。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内涵的解读，不同的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但都一致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指使人们具有共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远大理想，具有营造“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氛围的自觉，具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情怀，人民群众要自觉抵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文化，要增强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的认同。但需要注意的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并不是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同化。

其次，加强且规范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供给，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平衡发展。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供给是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与前提。首先，要构建普惠性的高品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体系。总体而言，当前我国高品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资源较少，现有资源大多是盈利性质的，这不利于保障社会大众公平享用高品质文化资源。政府供给的文化资源具有普惠性，但存在供给不足、品质较低等问题。因此要增强政府对高品质文化资源的资金投入和重视程度，通过与私营文化产业单位合作，努力构建普惠性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体系。其次，要加强文化产品与服务市场监管。在文化产品和服务发展过程中，除了努力增加文化产品供给数量与质量外，也要规范文化产品与服务发展，着重关注质量监管、价格监管、内容监管。尤其要特别关注网络文化产品的监管，坚守网络建设阵地，确保网络文化产品健康、有序发展。最后，要促进文化产品与服务均衡发展。面对文化产品与服务分布不均的现状，首先应锁定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的地区。其中，农村地区的共同富裕是推动共同富裕的短板和洼地，农村地区精神文明建设也较为滞后。受社会历史的影响，农村地区还存在许多“恶习”与“陋俗”，极大阻碍了农民思想观念现代化的进程。因此，需要加强对农村地区价值引导，既要对原有不良文化进行分析和批判，又要向农村地区不断输入积极向上的文化观念，也要加强农村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公共事业的建设，以充实广大农民的精神境界。更为重要的是，加强农村地区精神文明建设，还有利于发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辐射效应，为增强农村居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提供精神支持。

责任编辑：耿旭光

^①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ABSTRACTS

Analysis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Xi Jin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Tong Chengshuai, Zhou Xiangjun(1)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adheres to the Marxist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and profoundly reveals the essential features and basic laws of great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has deep philosophical and theoretical roots and is a model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Diplomatic epistemology is the core interpretation that outlines the overall objectives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Chinese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and the historical view of diplomacy is the law of origin and flow that reflects the laws of movement and dynamic features of diplomatic history itself and provides important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Xi Jin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and an explanation of its underlying philosophical mechanism and logic are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this thought, and for an accurate study and judgment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goals and logical direct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work.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Ontology; Methodology; Epistemology; History

The Connotation of the Era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Long-term Dilemma and Realization Path

Jia Zeqin, Gong Xiaoying(20)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is common affluence with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which is a conglomerate of the concep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social change, and the state of good living.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clarifying the unique conno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the key is to clarify the long-term dilemma faced by solid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find out its solution ideas. At present, the problem of relative poverty, the problem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problem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spiritual life are all practical shackles that hinder the long-term and stability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must be cracked one by one, and the solutions are: First, solidly promote "getting rich first and getting rich later" and focus o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relative poverty; second, cultiva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thods and firmly establish the ecological found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ird, adjust cognitive biases, and take multiple measures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of spiritual life.

Key words: New Era; Common Prosperity; Long-term Hardship; Relative Poverty; Common Prosperity in Spiritual Life Work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 Political Economy Interpretation

Zhou Shaodong, Zhang Yuying(30)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is an important goal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ideology and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y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development results, but it has also developed a crude export-oriented low-level growth model. Taking the theory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micro, meso and macro levels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explores the inner mechanism of the crude growth model that widens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and hinders common prosperity,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It defines the meaning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mode and summarizes four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s of shifting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ode: the effect of improving the remuneration of skilled labor, the effect of gathering resources in the real economy, the effect of optimizing the regional layout of industry and the effect of two-way flow of resour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y gradually narrow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between labor, industry, region and urban-rural areas, common prosperity unde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an be realized.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stablishing Unified Domestic Marke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stitutional Obstacle, Breakthrough Path and Policy Trend

Ling Yonghui(53)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which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boost each other, with the domestic market as the mainstay, the unified domestic market is a kind of tool, resource and means that China's economy can rely 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home market. This paper mak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in-